

唐

● 唐任伍 / 著
代

经济思想 研究



● 北京师范大学

.2

仁

北京师范大学教材专著出版委员会审定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资助出版

唐代经济思想研究

唐任伍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陶虹

封面设计 李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经济思想研究/唐任伍著.-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ISBN 7-303-04134-6

I. 唐… II. 唐… III. 经济思想-研究-中国-唐代 IV. F092.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7488 号

唐代经济思想研究

唐任伍 著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875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25 字数:226 千

1996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500 册

定价:9.75 元

序

关于唐代经济思想的论著,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中多有相应章节,此外,尚有为数不多的论文。总的来说,相对于唐代的辉煌历史和它在政治经济上实行的重大变革,应有更多和更大分量的著作出现,以表述唐代思想家的经济思想。现在出版唐任伍博士的博士论文《唐代经济思想研究》一书,正是适应丰富唐代经济思想研究的需要。

研究唐代的经济思想,比较来说,在思想资料上是受到特殊限制的。唐代两个著名人物,一个是执掌财赋大权和改革盐政前后达二十余年之久的刘晏,一个是创议和推行两税法的宰相杨炎,二人都因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横遭贬诛,除以后史家为他们所写的传记外,未留下他们自己的奏章和论著。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有《杨炎文集》十卷,《制集》十卷(苏弁编),但早已散失,迄未见传世。这种情况,不能不给研究唐代经济思想者以很大限制。这是历史条件的限制,人们无法改变这些条件,我们只能从现存的思想资料中去发掘爬梳。但研究唐代的经济思想,也还有它的有利条件。唐代是继隋代之后推行科举制的朝代,不论他是史学家,或是古文家,或是大诗人,他们都是通过科举并担任过大小不同的治民官职的。他们接触到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因而他们虽然不是以经济专家的资望来注意和论述经济问题,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就所接触到和感受到的经济问题,记其事、陈其见。不用说著作《通典》的理财家、史学家杜佑是如此,大文学家韩愈、柳宗元,大诗人白居易等也都是如此。所以唐代的经济思想资料,可以从不以论述经济问题著称或并未掌管过财赋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著述中去寻找。这是过去治唐代经济思想史者所走的道路,也是本书作者从事研究所遵循

的道路,是完全合乎客观实际的。

经济思想的专题研究和断代史研究,是使《通史》日趋完善的必经步骤。本书是断代史唐代经济思想史的首起著作,是专门研究唐代经济思想很好的一个开始。想今后必有继起者,钩沉发微,不断前进,斯岂特宏扬唐代经济思想之幸也哉!企予望之。

巫宝三

一九九五年六月

于近海居

目 录

序 言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研究的方法和手段
内容的梗概与特点

第一章 唐代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特点

- 一、大一统局面的重新形成 (6)
- 二、政治关系的变化 (9)
- 三、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 (18)
- 四、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37)
- 五、学术文化的兴盛 (54)

第二章 田制思想

- 一、均田论 (67)
- 二、抑兼并复井田论 (83)
- 三、租佃观点 (91)

第三章 财政思想

- 一、唐初财政观点 (108)
- 二、用商品经济原则处理财政的思想 (113)
- 三、围绕两税法争论的三大财政观点 (129)
- 四、薄敛轻税论 (155)

第四章 货币思想

- 一、关于货币起源、本质和职能的思想 (165)
- 二、任民铸造说与国家垄断铸造说 (180)
- 三、金属货币论与实物货币说 (188)
- 四、货币数量说 (191)
- 五、货币拜物教观念 (201)

第五章 商品经济思想

- 一、商品经济观念在唐代的发展 (208)
- 二、宽商利末论 (219)
- 三、发展商品经济的改革论 (232)
- 四、和籴和雇论 (242)
- 五、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论 (252)
- 六、虚名实利的功利论 (258)

结语：唐代经济思想的地位 (263)

附录：

- 一、唐代的度量衡制 (270)
- 二、唐代户口数字 (271)
- 三、唐天宝中户税、地税及租庸调估计收入数 ... (272)
- 四、唐代均田制下各类人授田额数 (272)
- 五、文中主要人名索引 (274)

参考文献..... (282)

导 言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经过几代人的开拓和发掘，现已初具规模。但由于学科处于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临界点，无论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尚有许多需待开垦的“处女地”。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商品经济空前发展，新的经济事物不断涌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变革的气象。作为反映社会经济生活变化的经济思想，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但是，对于唐代经济思想的研究，除了几部经济思想通史中的部分章节及散见于报刊杂志上的一些研究论文外，至今尚无一部专门研究和探讨唐代这个重要时代的经济思想著作，显得与这个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时代很不相称，也与唐代的文学艺术、哲学思想等方面的研究不相适应。究其原因，资料的浩繁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恐怕是与学术界认为唐代除了财政思想外，其他方面比较平淡的认识有关。

事实上，唐代不但有丰富的经济思想，而且在许多方面均有相当杰出的见解，并对唐以后各代，尤其对宋代经济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即使从世界范围内考察，唐代的经济思想也有它的重要意义。

为了进一步丰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我选择了这个研究比较薄弱、难度比较大的课题。因为我认为，这一研究是很有意义的。首先，从学术价值上来说，这一研究，既可填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也可填补

唐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其次，从实践意义上说，这一研究，不但进一步开拓、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而且对于探讨中华民族的国民意识的发展，展示中华民族心态的历程，也有一定的作用。民族的今天是昨天的延续，对民族昨天的研究，是为了民族今天的进步、繁荣和明天的发展、创新。因此，对于尤其能反映民族意识和心态、反映时代经济发展和变革的经济思想的研究，对于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国民观念的变革、心态的调适，无疑也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研究的方法和手段

“经济思想是有关经济问题特别是有关公共政策的所有意见与愿望的总和，而公共政策是与特定时间与地点浮现于公共舆论中的那些问题有关的。”^① 要研究经济思想，就必须首先了解和掌握“所有意见和愿望的总和”以及与之有关的“公共舆论”。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大都从属于经邦治国、经世安民的理论，因此，有关经济思想的论述大多散见于政论奏折及文学、历史的描述之中，这就尤其需要进行广泛的资料搜集和整理。

对唐代经济思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我在十年前就开始了，并通览了我所能见到的有关唐代的典籍，整理、注释、翻译了30多万字的资料，经数易其稿和巫宝三先生、王同勋先生、朱家桢先生的删修，资料业已纳入巫宝三先生主编的丛书出版。^② 在搜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懂得，要进行经济思想的研究，要写出言之有理、证之有据的经济思想著作来，掌握丰富的第一手

^① (美)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66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② 见巫宝三主编、王同勋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资料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和基础，“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①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又进一步搜阅了唐代笔记小说、诏令奏折以及出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并尽可能地接触大陆、港台及日本学术界对唐代的各种研究成果，广求参验，博采众长，力求使研究更扎实、更深刻，评述更公允、客观。

在研究过程中，我力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紧紧扣住唐代承先启后所呈现出来的时代特征，并吸收、借鉴各种研究方法，如归纳的方法、演绎的方法、比较的方法等，把唐代经济思想放到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长河中和世界经济思想的范围内，去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进行考察，以把握唐代经济思想的脉络和特征。

在写作中，我以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为红线，遵循历史的发展与逻辑的顺序相统一的原则，以问题为“经”，以人物为“纬”，上溯其源，下探其流，既考其史实，又论其因果，纵横比较，史论结合。写作时，引证力求真实，评述务求平正，既注意整体架构，又注意阐精发微，力图真正写出唐代经济思想的特色。

我在研究与写作中，不拘泥于某一种固定的模式，其目的是想通过各种方法的综合，使唐代经济思想研究在保持学术性的基础上，更多地引起读者的共鸣。正如著名经济思想史家约瑟夫·熊彼特在论述经济分析的方法时所言：“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其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

^①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和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第三,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① 同样,历史的方法和联系的方法,也是我研究和写作唐代经济思想最重要的方法。

内容的梗概与特点

本书在结构框架的布局上共分五章。第一章带有总论性质,它主要对唐代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从政治结构、土地制度、经济关系、思想文化、观念意识等诸方面进行了分析,集中提炼出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募兵制代替府兵制、庄园制代替均田制、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四大变化,概括出了唐代表现出的商品货币经济发展、人身依附关系弱化、地主经济成熟、贵族政治式微、门第等级观念衰落的五大特点。第二章集中分析了田制思想,其中重点分析了均田思想、复井田思想和租佃思想。第三章分析了财政思想,其中重点分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用商品经济原则处理财政的思想和围绕两税法争论表现出来的财政观点。第四章分析了唐代思想家围绕解决货币流通中出现的“钱荒”问题而提出的种种货币思想,其中重点分析了货币数量说。第五章分析了最能反映唐代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商品经济思想,重点分析了宽商利末论和发展商品经济的改革论。

在研究中,我既注意吸收、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又不拘成说,有所创新。因此,本文在内容上有下列几个特点:首先,研究资料取材的范围广泛。在重视研究经济制度和各个思想家的经

^① (美)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29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济思想资料的同时，又从唐代的笔记小说、公私文书、诗歌作品、帝王诏令、农民起义口号以及敦煌、吐鲁番文书等不太被人重视的资料，提出并研究了租佃思想、高薪养廉思想、对轻重理论的发挥的思想、对外贸易思想、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功利思想等理论观点，丰富了唐代经济思想的内容。其次，在理论上作了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对学术界的一些传统理论和观点进行了再认识，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对“抑工商”从国策和观念意识进行了区分，并指出中国古代的“抑工商”只是抑私商及其具有合理性的一面；提出了“不抑兼并”、“田制不立”思想在唐代的发轫；提出唐代经济体制改革具有超时代性及和籴和雇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直接产物等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

系统地对唐代经济思想进行有价值的研究，以我的学力和功力显然是力不从心的。如果说本文能对促进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所裨益的话，那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巫宝三先生和朱家桢先生。在论文的整个写作过程中，从选题取材、框架构思、内容安排、观点提炼，一直到文字表述，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同时，我还要感谢赵靖先生、王同勋先生在某些观点上给我的启示。

学术之路是充满艰辛和崎岖的，但一旦迎来收获的季节，心灵上将感到由衷的慰藉和满足。与其驾轻就熟，不如披荆斩棘。正如一位哲人所说：“向天空瞄准的人，比向树梢瞄准的人射得高得多。”^①

^① 见巴克所引《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政治思想》第160页。

第一章 唐代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特点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时期，被史学家称为封建社会的盛世。它上变汉魏下启宋元，有学者称其代表着中国“中世”期的终结和“近世”中国的开始。^①在近30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组织、经济以及思想、宗教和艺术生活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一度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文明、最富强的帝国。唐代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发育臻于成熟、鼎盛的代称，后人言盛世者必以“汉唐”相称，尤其是“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更为后世所乐道。

鼎盛常与衰落相随。就在唐帝国鼎盛发展的同时，也预示着衰落的开始。唐帝国就是以这种双重的身份，呈现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可以说，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而特殊的朝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转折点。正因如此，“西方学者也早就对这一时期着了迷。”^②

一、大一统局面的重新形成

统一的唐帝国的建立 造成唐代鼎盛的前提，是重新建立了中国的大一统。秦汉建立的统一帝国崩溃以后的300多年间，中国一直处于一种混乱的封建割据状态之中，其间虽然西晋在公元280年统一了全国，但统治力量不强，时间也很短。北方黄河流域

^① 见H·宫川：《略论内藤的假设和它对日本的中国研究的影响》，载《远东季刊》，14. 4（1955年）第533—552页。转引自〔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② 见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各少数民族长期处于分裂混战之中，成为中国历史上割据战乱最长的“五胡十六国”时期。这种长期的战乱，严重地摧残了商品经济，阻滞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公元 581 年，隋文帝夺取北周政权，建立了隋朝。他在经济上继续推行均田制，在政治上实行改革，推行府兵制和科举制，加强了封建中央集权。公元 589 年，隋出兵灭了中国南部的陈朝，统一了南北。从而中国历史再一次回归大一统。南北的统一，打破了“旧制以淮禁，不听商贩辄渡”的局面，^① 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重新统一后的隋帝国，由于统治者的骄纵和好大喜功，沉缅于巨大的公共工程的修造和对外扩张之中。在短短的时间里，连续征发 10 万至 100 万不等的人力修筑长城；役使丁匠 200 余万人营建东都；征发数百万人开挖运河网络；并对高丽进行了一次代价高昂但劳而无功的讨伐。这些连续不断的工程营建和用兵，极大地削弱了隋帝国的国力，引起国内普遍的苦难和不满，导致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公元 618 年，代表关、陇地主贵族集团利益的李渊起兵灭了隋朝，建立了唐王朝。它创立了一个比隋朝更加强大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消除了封建割据对商品经济发展的阻碍，促进了商品货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交通的畅通 发达的交通，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隋代政权生命虽然短促，并滥用民力，但隋代统治者开凿连贯南北的交通动脉大运河，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大运河的开通，没有为隋代经济的发展带来什么利益，但它遗惠于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唐代统治者执政以后，对隋代修筑的水上交通设施进行了整修，使之更适应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引渭水从大兴城到达潼关的广通渠，亦名富民渠，“转运通利，关内赖之”。^② 唐人对大运河在

^① 《北齐书·苏琼传》

^② 《隋书·食货志》。又见《郭衍传》。

唐代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赞语甚多。

“今自九河外，复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①

“通济渠，西通河洛，南达江淮……其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②

“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漕运，私人商旅、舳舻相继。”^③

这条贯通南北的大动脉——大运河中，“商旅往还，船乘不绝，”^④足见其对经济交流的作用之大。因此，大运河沿岸，商业都市日益繁荣，如运河南端的杭州，运河和长江交口处的京口和江都，运河和淮河会合处的楚州，运河和黄河相遇处的汴州等，都成为一方繁盛的都会，成为物资和人文荟萃的地方。

唐代的海上交通也初具规模。唐初进攻高丽，即曾由海上转输粮饷。唐中期，海上交通相当繁忙。开元年间，“沧州大风，海运船没者十一二，失平卢军粮五千余石，舟人皆死。”^⑤敦煌发现的唐代《水部式》，还记载着登、莱、沧、瀛等州，有海运水手3400人。所以，杜甫的《后出塞》诗说：“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不但两浙、山东、河北沿海有海运，两浙、福建、岭南沿海也通海运。唐朝还专门设置了管理海运的机构，安史之乱以后，淄青节度使还依旧兼带海、陆运使之职。^⑥

唐代对陆上交通设施的整治非常重视，把过去“以载则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的交通要道，整修成为“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的交通通衢。^⑦唐朝大大发展了前代以来的驿传制

① 《皮子文藪》卷四，《汴河铭》。

② 《通典·州郡典·河南府》。

③ 《元和郡县志》。

④ 《旧唐书·李勣传》。

⑤ 《旧唐书·五行志》。

⑥ 《旧唐书·德宗纪》上。

⑦ 见张九龄：《曲江集》。

度，全国有驿站 1639 所，其中“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相兼。若地势险阻及须依水草，不必三十里。每驿皆置驿长一人。”^① 国内的交通路线，如《通典》所载，以长安为中心，东至宋、汴、以至山东半岛；西至岐州（凤翔县），入于西川；西北至凉州，以通西域；北至太原、范阳；南至荆、襄，达于广州；沿路设有店肆，接待商旅，交通十分发达。

唐代的对外交通也非常发达，通往边疆少数民族和通往国外的道路一共有 7 条。《新唐书·地理志》云：

“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东安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

七条国际交通要道中，其中五条是陆道，二条是海道。陆道的主要交通大道仍然是沿着西汉开辟的“丝绸之路”，通往中亚、西亚及欧洲各国。海上交通路线已经成为唐代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有交广和楚扬两线，又称南线和北线。南线交广线主要是通往南洋和印度洋国家；北线楚扬线主要通往朝鲜、日本等国。

发达的国内、国际交通连成网络，使唐代的交通十分畅达。尤其是首都长安与对外海上交通中心广州之间，更是畅通无阻，水陆相衔，往来方便。发达的水、陆交通，为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政治关系的变化

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 科举制作为一种官吏的选拔制度始于隋朝，但作为制度的确立和完成则是在唐代。

^① 《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

科举制产生以前，官吏的任用是靠九品中正的门阀选举制。这种制度，不重视个人的能力和才干，而主要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人才的任用和升降。因此，在九品中正制下，中央以及州、郡中的大小中正，都由门阀世族担任。而选拔人才、分别等第，又完全掌握在这些担任了中正的门阀世族手中。负责选拔人才的封建中央的吏部，则基本上是按照州郡大小中正所选拔和评定的等第来任用的。《通典》上说：“吏部不能审定核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铨第等级，凭之授受。”^① 所以，九品中正制下官吏的选举权，是掌握在担任了州郡中正的门阀世族手中，他们选拔出来的人，当然是门阀世族中的人，并且是门第愈高，品第也就愈高，开始的官级也愈高，从而造成了“唯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② “世胄蹶高位，英俊沉下僚”。^③ 而这些依靠九品中正制选拔出来的门阀世族中人，又必然极力维护门阀世族的利益，巩固世族的地位。因此，九品中正制是支持门阀世族政治的一大支柱。是中央集权政治的反映。

隋唐以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门阀世族政治最盛的时代。这些世家贵族，不但在经济上拥有优厚的势力，而且在政治上也享有特殊的地位。他们世代相续，形成一种贵族政治，与封建中央政权抗衡，使得政权不断更换。因此，门阀世族不仅妨碍了经济的发展，而且更阻碍了进一步的中央集权。由于隋唐时期地主经济的高度发展，全国地主阶级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以便加强对农民的统治。而建立起在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农民这个基础上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府，就必须首先打垮门阀世族的势力；要摧垮世族的势力，就必须摧垮支持其政治势力的杠杆九品中正制度。把官吏的任免权柄集中到中央政府手中。

① 《通典》卷十四，《选举》二。

② 《通典》卷十六，《选举》四。

③ 左思：《咏史诗》。